

阿拉伯帝国为何没能产生重商主义？

李荣建 王 鹏

摘 要：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看，重商主义的兴起为近代欧洲崛起、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阿拉伯帝国也曾具有某些发展重商主义的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的剧变导致经济模式的改变和重农主义的崛起。“哈里发”制度既不能有效动员体制内力量进行国际竞争，又无法与体制外力量建立联盟——像西欧一样发展产业城市、市民阶层。反对重利的伊斯兰经济伦理与由利己主义衍生出的重商主义格格不入。所有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动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阿拉伯帝国难以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重商主义。

关 键 词：重商主义；阿拉伯帝国；伊斯兰经济伦理

作者简介：李荣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王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07 级硕士生，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进修生（湖北武汉 430062）。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7) 06 - 0026 - 06

中图分类号：F37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重商主义自 15 世纪兴起于西欧，为西方商业资产阶级原始积累起过重大推动作用，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制度和精神基础。早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前，阿拉伯半岛就已具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崇商传统。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建立，7~13 世纪的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已在诸多领域都具备了较 15 世纪的西方更利于产生重商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条件，但结果却相去甚远。本文将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西欧与阿拉伯帝国相关领域的情况进行横向对比，力图对此现象作出解释。

“阿拉伯”与“伊斯兰”两个概念间具有相当的重叠性和模糊性，不同历史时期的阿拉伯王朝（帝国）在幅员、人口、政经状况上差异较大。“麦瓦利”的阿拔斯及其后诸地方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已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1]82}，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阿拉伯帝国”而是“伊斯兰帝国”^{[2]359}。本文将“阿拉伯帝国”时间定位为穆圣时代到倭马亚王朝（约公元 570~750 年），其地理范畴为穆圣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倭马亚王朝“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跨有亚、非、欧三洲的土地”^{[1]72}。运用历史动态分析法考察阿拉伯帝国的政经文教状况后，对比产生重商主义的必要条件与阿拉伯帝国所具备的历史条件，探讨其未能产生重商主义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二、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产生于中世纪末期, 作为“似乎支配从 16 世纪初到差不多 18 世纪末的经济论述中的经济思想的松散体系”^{[3]34} 和“欧洲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和政治体系”^{[4]1739}, 其早期 (15~16 世纪中叶) 表现为“重金主义”, 即通过多种手段为本国攫取贵金属; 晚期 (16 世纪下半叶~17 世纪中叶) 则表现为“真正的重商主义”, 即奉行贸易差额论^{[4]1740}, 主张通过外贸出超增加本国贵金属存量。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有三点:

1. 货币供需链条的产生

在整个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中, 货币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国家财富往往等同于它所占有的货币数量。近代西欧城市是作为“商业聚落”^{[5]76} 而崛起的, 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西欧各国商品流通量增大、货币需求量剧增。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日益崛起的民族君主都急需货币, 双方结成利益联盟, 君主以安全保障换取市民税收支持来扩充军队同教皇和地方争权。

因欧洲本身并不盛产贵金属且自然经济时代货币供应自给自足, 中世纪末期 (15 世纪初) 资本主义萌发之时, 人们则突然发现“欧洲缺金”^{[6]35}——A·H·马尔格斯曾指出当时西欧国家尤其葡萄牙等大西洋沿岸商品经济较发达国家普遍缺乏货币。生产力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西欧人将目光投向海洋, 地理发现与殖民扩张、商贸发展相伴而行。盛产贵金属的美洲大陆使西欧突破了货币瓶颈, 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更大的货币需求, 掌握先进航海、军事技术的西欧人从南美等地获取巨额贵金属, 有力地突破了当时西欧的货币瓶颈, 激发了经济、社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但人们又需要更多的货币以满足新的需要……这个完整货币供需链条滚雪球式的运行正是重商主义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内在动力。

2. 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建立

重商主义的重要特征“国家主义”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殖民掠夺、强制劳动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是确保以上措施得以充分实现的根本保障。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存在可以保证实现重商主义者的目标”^{[7]13}, “民族国家是天主教世界的对立物”^{[8]16}, 西欧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君主、市民对抗教皇和封建领主的策略联盟及由此引发的君主王朝战争, 削弱了教皇的专制权力和封建领主的割据势力, 强化了君主的中央集权。

3. 利己主义的兴起。

利己主义是人文主义在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一种变体。欧洲中世纪的思想认为, “人类心智的发展完全是神学的发展”^{[9]102}。人自身的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 人的意愿获得尊重。文艺复兴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催化剂, 也是“中世纪封建神学衰落的结果”^{[7]16}。人文主义旗帜鲜明地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 肯定物质享受和世俗幸福, 追求个性解放、个人奋斗, 反对禁欲、来世和蒙昧主义, 但在张扬人性、冲破神权禁锢的同时, 也冲向了另一个极端——利己主义。

基督教会后期的腐败与贪婪带给人们精神迷茫和原始欲的膨胀。对金钱的渴望和对权力光明正大的追求催生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及其理论, 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非宗教经典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从解剖人性入手分析政治, 肯定人自私自利、追求利益的本性,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国家经贸理论。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一种以邻为壑的“零和”外贸政策。重商主义者认为, 除开采自身矿源外, 国家的财富增长只能从别国获取, 国家间没有真正的合作, 只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和临时策略联盟。人文主义→人性张扬→(个人的)利己冲动→(国家的)利己冲动→贸易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是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逻辑链条。重商主义是一种只有在当时的欧洲才有可能产生的利己主义的产物, 而阿拉伯帝国及其伊斯兰经济伦理则不具备这一条件。

三、比较经济史：阿拉伯帝国与西欧

第一，前穆圣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人“大部住在半岛，半岛是他们最重要的居住地”^{[10]1}。半岛大致分为沙漠地带和滨海山区，地理上的二元背景使阿拉伯人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民族性格上呈二元分裂状态。阿拉伯人可分为游牧人和定居者，游牧民占大多数^{[10]8}。此时的阿拉伯社会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沙漠地带的贝都因游牧民轻视商业，专以牲畜产品为生；而生活在沙漠边缘地带、与东方的波斯或西方的罗马接壤的定居民则以农业和商业为生，“游牧经济在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商业经济则集中于半岛的汉志地区”^{[11]15}。

这一切均程度不同地影响了贝都因民族的性格形成：游牧人剽悍尚武，定居者精明重商；游牧人强调对部族的忠诚，私有观念有限^{[10]9}，定居者私有观念较强，又经常被生活在沙漠地区的同胞们“强行索取生活资料”，为贝都因民族内部和日后阿拉伯帝国内部的纷争、分裂埋下了深深的伏笔^{[12]24}。但“喜欢无限制的自由”、“爱好部族和种族范围内的平等”^{[10]41}等又成为阿拉伯民族性中明显的共同之处。

第二，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与重商主义

阿拉伯半岛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二元历史背景也对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穆圣时代，阿拉伯民族正从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转化，氏族制下的平等思想、集体互助精神积聚在阿拉伯民族性中（尤其游牧民）。由于汉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私有思想萌生，先进的社会体制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新生的宗教体系中。伊斯兰教既继承了当地的传统（对二元背景的调和），又开辟出新的民族上升通道（民族统一与对外扩张），因而得以广泛传播。

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对重商主义发展的正面影响在于“重视商人”、“崇尚商业的价值观”、“商业原则”及“商业道德”^{[11]29}，但严禁重利的原则又从根本上否定了重商主义逐利的价值取向。伊斯兰教的“福利”、“均富”思想在逻辑上是重商主义的对立物。有学者对伊斯兰经济伦理做过如下总结：第一，伊斯兰教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抑制财富的过度集中；第二，伊斯兰教允许财富收入存在适当的差别；第三，在债权、继承权和经营管理权上，伊斯兰教主张契约和济贫。总之，它既维护私有制，又主张抑制贫富分化。^{[11]25-31}

重商主义主张应尽可能地夺取、集中财富，而作为“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产物”^{[11]71}，伊斯兰经济思想实际上在反对和允许贫富分化之间进行调和。私有制社会里贫富分化是必然现象，伊斯兰教在默认贫富分化的同时，由于其“深刻的宗教道德烙印”、“浓厚的福利精神”和“相对平等”^{[11]66-71}以及“提出保障人人享有真主所赐财富权利的主张”，通过降示诸如“他们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14]51:19}等启示来缩小贫富差距。

客观地说，没有西欧重商主义者对财富的贪婪与对扩张的向往，很难设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地开展。重商主义的兴起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君主——市民联盟对教皇、领主的胜利，也是大资本家对小工厂主的胜利。贫富分化是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对贫富分化及其后果的暂时默许，是西欧跨越文明发展进程所付出的代价。重商主义的重利倾向不具道德合理性，却具历史合理性，这正是阿拉伯帝国未能发展出重商主义的原因之一。

上述基本矛盾在伊斯兰经济伦理的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11]48}，如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重商主义开始盛行的时代，银行业、信贷业蓬勃发展。银行家获利的同时又吸引了更多的从业者，从而使近代金融业步入滚动发展的轨道，这是重商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5]188-204}但伊斯兰经济思想中却存在着严格“禁忌”的思想，如《圣训·论吃利息者》^{[15]32}篇，就将“吃利息者”比作泡在血河里不能也不准出来的人。因为，没有信贷机构的支撑，很难发展重商主义的国民经济。

第三，倭马亚王朝与西欧经济状况对比

随着对外征服的开展，“阿拉伯帝国”的地理内涵由原先贫瘠的半岛扩展到“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伊拉克，伊朗的呼罗珊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也门”等“富饶的农业区”^{[16]166}。地理环境的改变导致社会民族结构的转型，倭马亚王朝已是由阿拉伯人、波斯人、伊拉克人、埃及人、柏柏尔人乃至西班牙哥特人等组成的多民族大帝国。虽有通婚和民族融和^{[17]210}，但不同民族原有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文化特性并未泯灭，而是以全新的社会结构形式表现出来。

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倭马亚王朝经济模式向重农主义转型，攫取战利品成为国家最初收入的主要来源。阿拉伯新贵居住在“米绥尔”（新建营地），靠领取饷银为生^{[13]58}。随着征服的渐止，税收成为帝国经济主要来源。当时稳定的农业收入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自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以来，几乎所有帝国统治者都尽可能地鼓励发展农业，如穆阿维叶“下令治理伊拉克大沙河，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14]167}等，此时的阿拉伯帝国经济政策已经转向了重农主义（physiocracy），成为“18世纪重农学派的一种思想体系，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的经济学说，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出‘纯产品’，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18]983}。其特征有三：一是具有封建外观；二是以“自然秩序”为思想基础；三是极端重视农业。^{[19]347}倭马亚王朝逐步确立了以自然经济为依托的封建生产关系，哈里发及土地贵族极为重视农业生产，多次颁诏令“劝农”^{[14]168}。重农主义在东方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抑制为学术界所公认；在西方，它作为魁奈等学者提出的一种经济思想，本身就是对重商主义的一种批判和否定^[20]。随着重农思想在帝国日渐盛行，重商主义就更没有产生的空间了。

帝国疆域的扩大使“各省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2]362}，贵金属的丰裕无疑有利于商贸发展，但它在阿拉伯帝国却造成了相反的结果。西欧货币的供需链是产生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的“内在动力”，但阿拉伯帝国充裕的贵金属又使贵族享受了奢侈并满足于现状。前穆圣时代，也门南部及麦加等城市奴隶制已确立优势。^{[13]74}帝国又通过“狄万”^①制度确立阿拉伯统治者作为奴隶主的经济特权地位，许多阿拉伯人成为靠奴隶供养的土地贵族。物质和政治上的优越性磨灭了大征服时代后阿拉伯人的进取心和征服欲，也加速了这个“食利民族”的腐化和衰亡。

阿拉伯帝国拥有如巴格达、巴士拉、开罗等商业繁荣的城市，但与中世纪末期西欧城市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城市居住的是剥削乡村采邑财富^{[1]201-225}的封建主，它的繁华仅限于封建体制下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流通领域，以总量庞大但规模有限的小商品经济、带有浓重官办色彩的指令经济（如御制厂）和带有封建甚至奴隶制色彩的自然农业经济为依托。而西欧的新兴城市恰恰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者而成为“制度分化的产物”^{[5]80}，它先依附于乡村、封建主，然后壮大、自给自足，最后“作为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的权力中心而向封建主挑战，甚至城市进而控制乡村，成为乡村的支配者”^{[5]82}。此时的西欧城市，不再是王公贵胄显示排场的舞台，而是为资本主义的萌发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双重支撑的产业中心，而这恰是阿拉伯帝国都市所不具备的，其繁荣表象的背后是封建指令性经济与小农经济的混合物，难以转化为重商主义。

第四，倭马亚王朝与西欧政治状况对比

“倭马亚王朝的政治制度多效仿中央集权的东罗马帝国，哈里发集政、军、神权于一身，^{[13]72}但“倭马亚王朝的集权主义是相对的，哈里发的权力远未达到东方专制君主那样的绝对独裁，他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各省总督和阿拉伯部落长老会议的制约。倭马亚王朝实际上是由许多部落、民族、宗教和军事集团组合起来的比较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哈里发不过是这些集团的共同首领而已”^{[21]398}。如前所述，阿拉伯民族性中对本部族的绝对忠诚等倾向是造成这种松散专制体制的原

①“狄万”，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名册”、“登记簿”等。

因之一，这对需要强化中央政权提供制度保障的重商主义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西欧君主对市民的控制力不见得大于阿拉伯哈里发对其臣民的控制，只是当时“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型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21]467}他们上下一心，将重商主义定位为国家战略，把西欧国家纳入了“以商养战、以战保商”的体系之中。法国财政大臣、著名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坦言：“贸易是常年的战争……谁在贸易中占居首位，谁就可以成为战争与和平的裁判者……一个国家的海军永远与它的贸易成正比例。”^{[22]164}

可见，一方面，哈里发与地方上专权的埃米尔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对后者的控制力不能与已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西方君主相比，难以将外贸争夺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是不存在近代西欧意义上的产业市民的，这从源头否定了哈里发与市民的联盟及重商主义生成的可能。

四、结语

阿拉伯帝国与重商主义的失之交臂决非偶然，其中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前穆圣时代，阿拉伯半岛地理上的二元分布导致贝都因人生活方式上的二元分裂及观念性格上的差别。伊斯兰经济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二者进行了调和，但遗留下来的诸如反对利己主义、有限的私有制等因素与重商主义背后所蕴含的极端利己主义、私有制等因素根本抵触。倭马亚王朝建立后，由于大片良田及诸多民族并入版图，整个帝国的民族、经济、社会结构随之转型。经济上，作为统治阶级的大部分阿拉伯人转变成了食利的剥削者，丧失了进取心和征服欲。农业作为前工业时代最稳定、有效的收入来源诱使整个国家向重农主义转型。在当时的制度下，贵金属的丰裕又助长了王公贵族的贪欲、奢侈与满足现状。小商品经济、浓重官办色彩的指令经济和带封建甚至奴隶制色彩的自然农业经济为依托的“寄生繁荣”与西欧的新兴产业城市、市民阶层形成鲜明对照。迥异于东西方政权的哈里发制度，既不能有效约束地方埃米尔，统一对外政策，进行国际竞争；又无法像西欧民族君主一样与产业市民结成利益联盟，加强王权、统一体制、对外扩张。物质和精神上的动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阿拉伯帝国没能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重商主义，更无缘于资本主义。

研究阿拉伯帝国经济社会史，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方面，“历史是割不断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和外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23]另一方面，同为东方古国的阿拉伯—伊斯兰诸国与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对它们的研究能为我们解决自身问题提供某些参照。

[参考文献]

- [1] 郭应德. 阿拉伯史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2]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1500 年以前的世界) [M].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3] 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 罗伯特·F·赫伯特.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 [M]. 杨玉生, 张凤林,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4] 于光远. 经济大辞典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 [5] 厉以宁. 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6] 周世秀. 葡萄牙何以率先走上海上扩张之路 [J], 世界历史, 1996 (6).

- [7] 斯坦利·L·布鲁. 经济思想史(原书第6版)[M]. 焦国华, 韩红,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 [8] 张跃发. 近代文明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 [9] 基佐. 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到法国革命[M]. 程洪逵, 沅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10]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一册 黎明时期[M]. 纳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1] 刘天明. 伊斯兰经济思想[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 [12] 希提. 阿拉伯通史(上、下册)[M]. 马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3] 郭应德. 阿拉伯中古史简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4] 古兰经[M]. 马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5] 穆斯塔法·本·穆罕默德·艾玛热.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M]. 坎斯坦勒拉尼, 注释. 宝文安, 买买提·塞来,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6] 李荣建. 阿拉伯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
- [17] 默父. 阿拉伯帝国[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 [18] 21世纪英汉经济实用词典编写组. 21世纪英汉经济实用词典[Z].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 [19] 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 吴斐丹, 张草纫,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20] 布罗代尔. 文明史纲[M]. 肖昶, 冯棠, 张文英, 王明毅,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1] 吴于廑. 世界古代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22] 何正斌, 何鑫, 王梅梅. 重商主义富国强兵政策的启示[J]. 船山学刊, 2004(3).
- [23] 王洛林. 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J]. 北京: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4(4).
- [24] Stavrianos, L.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M].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Why Arabic Empire Hadn't Developed Mercantilism?

LI Rongjian WANG Peng

Abstract Mercantilis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apitalism. Arabic Empire also got some beneficial condition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geography, society, economy, policy, religion and ethics, at last, it hadn't developed classical mercantilism. By the use of historical movement analyzing method and comparative analyzing method, we will firstly study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mercantilism in this article, then study the condition of some related fields of Arabic Empire, and finally conclude the reason for why Arabic Empire hadn't developed mercantilism.

Key words Mercantilism; Arabic Empire; Islamic Economic Ethics

(责任编辑: 马丽蓉)